
“场所转移”与国际规则改革： 动力和制约^{*}

余博闻

【内容提要】 当发达国家在多边谈判中难以达成其规则改革目标时,它们可能会运用场所转移策略,将规则推广行动转移至其占力量优势的双边或复边平台,引导和劝说单个或少数目标国接受新规则,推动新规则的支持者和推广者力量逐步壮大,最终达成改变传统多边规则的战略目标。然而,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引导和劝说行动无法实现稳定的社会化效果,起决定作用的是新规则落地后的治理绩效。有积极绩效的新规则可以持续扩散并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认知,从而抵御规则制衡行动;那些产生负面绩效的新规则将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反思意识,更容易遭受规则制衡行动的冲击。对发达国家主推的所谓“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和碳定价规则不同发展轨迹的比较分析支持了上述论点。在“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方面,美国与欧洲国家虽然通过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了新知识产权规则的初步扩散,但随着此类规则负面绩效的不断显现,发展中国家正采取抵制和制衡等手段维护“南方优待”规范在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在碳定价规则方面,虽然欧盟的规则推广行动也曾遭遇挫折,但碳定价对低碳转型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实践检验并推动着新规则不断扩散。

【关键词】 国际规则;场所转移;规则竞争;知识产权;碳定价

【作者简介】 余博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3)04-0096-30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权力’—‘话语’—‘实践’三元驱动下的全球治理方案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EGJ001)的研究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多边主义快速发展和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日益强化的影响,发达国家按照自身意志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受到限制。^①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在国际规则体系的义务权利安排中应对其予以适当优待(简称“南方优待”规范)。在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贸易、知识产权和气候治理等领域的国际规则体系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南方优待”规范,发达国家改革此类规则的努力总会在多边场合无功而返。^② 又如,自上而下的责任分配和强制减排曾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正统路径:在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京都议定书》在采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同时,自上而下地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由此可见,经多边谈判建构的国际规则体系至少部分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而并非完全如发达国家所愿。^③

在多方场合难以达成其规则改革目标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场所转移(forum shifting)”策略推动国际规则改革。^④ 在该策略下,发达国家避开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选择更容易接受新规则的单个或少数目标国开展规则推广行动。新场所放大了互动双方的实力差距,增强了发达国家引导和劝说活动的有效性。^⑤ 同时,场所转移策略的目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规则推广。发达国家期待新规则的早期接受者会转变为推广者,进而促使新规则依靠网络效应加速扩散,最终替代

① 由于场所转移策略并不一定以建成一套包含规则、组织和惯例的完整国际制度为直接目标,本文主要使用“规则”一词,只在谈及制度竞争理论时使用“制度”的提法。此外,规范与规则紧密相连。规则虽然比规范更具体且具有指令性,但其内容往往反映规则制定者对适当行为的认知。规则扩散以规范扩散为先导,规则的稳定延续也需要相应的规范被国际社会成员广泛接纳。因此,本文在讨论扩散问题时常会将“规范”和“规则”两词并提。对相关概念的讨论,可参见潘忠岐:《广义国际规则的形成、创制与变革》,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5期,第3—23页;高尚涛:《规范的含义与作用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4—157页。

② Philippe Cullet,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Towards a New Paradigm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 No.3, 1999, pp.549—582; Lavanya Rajamani,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Issue 3, 2012, pp.605—623.

③ 参见刘宏松:《为什么冷战后国际制度的形成不由美国所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68—85页;王剑峰:《小国在联合国中的制度性权力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3期,第78—92页。

④ 也有文献使用了“体制转移(regime shifting)”这一概念。但由于相关行动可以是在新场所开展的以规则推广为目标的谈判或其他形式互动,并不一定依托于新体制,所以本文使用“场所转移”的概念。此外,为更加聚焦,本文所讨论的场所转移策略专指发达国家通过制造权力和话语优势推广与既有多边规则体系相冲突的规则进而谋求改变多边规则的行为。发展中国家在建构新制度和倡议时则通常不会产生显著的权力差距,其所推广的规则也一般与既有多边规则体系保持一致。因此这类行动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⑤ 对场所转移策略内涵的讨论,参见 Laurence R. Helfer, “Regime Shifting: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New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making,”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9, 2004, p.6.

传统的多边规则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场所转移策略与多边主义的国际规则建构模式存在冲突,它是强国对国际规则的单方面塑造,对经由多边谈判达成的相对平衡与灵活的多边规则体系构成了挑战。^①但是,以场所转移策略挑战多边规则并不总能成功。事实证明,场所转移策略虽然在实施之初能够推动新规则的扩散,但其长期改制效果并不确定。一方面,部分新规则能够在场所转移策略的助推下得以广泛传播并逐渐多边化,如欧盟通过双边气候合作推动了碳定价规则的扩散。虽然欧盟的规则推广行动也曾遭遇挑战,但碳定价已被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纳,并成为多边气候规则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有的新规则却在传播了一段时间后却后继乏力,如在知识产权领域,虽然场所转移策略确实推动了一系列超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保护标准的规则(简称“TRIPS-Plus 规则”)被部分发展中国家接受,但该类规则的扩散动能有衰减趋势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是:场所转移策略常能获得短期成功,但为何其长期效果却存在不确定性?有哪些因素造成了场所转移策略长期改制效果的差异?通过综合认知演化理论以及制度和规范竞争理论,本文提出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效果受到新规则落地后的治理绩效和外部规则制衡行动的双重影响。只有产生积极绩效的新规则才能稳定发展与持续扩散,并抵御规则制衡行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场所转移这一国际法文献经常提及的国际规则改革策略的理解,弥补既有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能动性重视不足且缺乏对该策略长期效果理论分析的缺憾。

二 既有研究评述

既有文献对场所转移策略的运行原理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其发现可总结为三点:其一,场所转移策略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主要是由于新谈判场所放大了发达国家的力量优势,使其具备更多资源引导目标国的行动;其二,作为辅助手段,发达国家可通过针对性的培训和知识传播等手段劝说目标国接受新规则;其三,研究者虽然普遍认同场所转移策略将直接影响目标国的行为,但对于该策略能否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网络效应,从而促使新规则持续扩散并逐步替换原有多边规则却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学界对规则扩散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既有文献总结了规则扩散的四个主要驱动机制:胁迫、利益诱导、教育和社会压力以及主动模仿。

^① 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9, No.4, 2014, p.392.

前两类机制旨在通过改变目标国的成本—收益分析促使其接受新规则,因而可被归为广义的“引导”机制。^①类似地,国际制度竞争相关理论也指出,大国的政治权力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是保证其制度建构和推广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②在这里,制度竞争也主要依赖胁迫和诱导机制,其与规则扩散的主要区别在于:竞争条件下的新规则扩散需要应对较强的传统规则体系,更强调赋予新规则的推广者相对优势地位,以增强其规则推广行动的效果。由于场所转移策略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传统多边规则,因而从制度竞争理论的视角理解该策略更为恰当。^③在多边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结成谈判联盟与合理利用规则(如多重否决权)制衡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的物质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在多边场合将受到抑制。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行动,发达国家既难以胁迫后者做出妥协,也缺乏足够的资源与之进行利益交换。^④将相关互动从多边场所转向双边或复边(plurilateral)场所(如自由贸易谈判和双边气候治理合作等领域)增强了发达国家影响目标国的能力。在场所转移策略下,发达国家所面对的互动对象一般是经过筛选的、被认为更容易受其影响的国家。在面对单个或少数目标国时,发达国家能够动用较少资源与目标国实现利益交换。同时,由于双边与复边合作的成果是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物品,这种合作能更有效地奖励新规则的支持者,并通过在多个对手间制造竞争关系的方式增大压力,迫使更多目标国妥协。^⑤

① 着眼于具体研究对象,也有文献使用“政策扩散”这一概念。对扩散机制的总结,参见 Erin R. Graham, Charles R. Shipan and Craig Volden,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No.3, 2013, pp.673-701; 刘伟:《国际公共政策的扩散机制与路径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4期,第40—58页。

②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59页;王明国:《从制度竞争到制度脱钩——中美国际制度互动的演进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第72—101页。

③ 参见 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pp.385-412。制度竞争理论指出,规则推广者除使用场所转移策略外,还可在没有权力优势的情况下新建制度,以推动新旧制度的竞争。本文不讨论后一种策略。

④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王中美:《多边体制的改进路径和未来——以WTO为例》,载《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第14—19页。

⑤ Kenneth C. Shadlen, Andrew Schrank and Marcus J. Kurtz,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9, No.1, 2005, pp.45-71; Brian Greenhill, Layna Mosley and Aseem Prakash, “Trade-Based Diffusion of Labor Rights: A Panel Study, 1986-200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3, No.4, 2009, pp.669-690; Zachary Elkins, Andrew T. Guzman and Beth A. Simmons, “Competing for Capital: The Diffus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60-20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0, No.4, 2006, pp.811-846; Eri Saikawa, “Policy Diffusion of Emission Standards, Is There a Race to the Top?” *World Politics*, Vol.65, No.1, 2013, pp.1-33; Moonhawk Kim, “Ex Ante Due Diligence: Formation of PTAs and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4, 2012, pp.704-719; 杨静:《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TRIPS-plus规则的立法动力分析》,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7期,第86—90页。

第二,由于实体规则往往需要以对相关规范的认同作为理念基础,因此规范的扩散可以带动实体规则的扩散。正因如此,前述规则扩散理论除理性主义逻辑外还包含认知逻辑。^① 建构主义规范传播理论较好地总结了规范传播的驱动机制:一方面,框定、言语施压、劝说和争论等以话语为基础的互动能够打破目标对象的固有观念,重塑其对适当行为的认识,促进新规范的传播;^②另一方面,能力建设并非单纯的技术性支持,而是试图通过改变目标对象决策者的知识结构提升其政策能力和信心,最终达到助力新规范和新规则扩散的目的。^③ 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研究在讨论发达国家在新场所的规范传播行动时,也主要将相关活动归为这两类。^④ 为使行文更加简洁,本文在谈及此类以社会化目标国为主旨的行动时,将其归为广义的“劝说”行动。当然,建构主义规范扩散理论已经不仅仅限于单向规范传播,而且越来越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能动性,提出发展中国家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规范,而是能够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规范本土化、创新和竞争行动。^⑤ 不过,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研究主要讨论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劝说行动。

第三,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改制效果问题,既有研究多以接受新规则的国家数量或各国签订的包含新规则的条约数量作为判断标准。多数研究 TRIPS-Plus 知识产权规则扩散的文献都以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的增加为依据,认为发达国家的场所转移策略是有效的。一些学者进而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规则,其在缔结新条约时可能援引这些规则,从而通过网络效应加速新规则的

①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From Europeanisation to Diffusion: Introduc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5, No.1, 2012, pp.1-19.

②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1, 2000, pp.1-39;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887-917; Alastair Iain Johns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David Belis and Bart Kerremans, “The Socialization Potential of the CDM in EU-China Climat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16, No.4, 2016, pp.543-559; Katja Biedenkopf, Sarah Van Eynde and Hayley Walker, “Policy Infusion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 and Project Interact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in China,”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7, No.3, 2017, pp.91-114.

④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Edward Gol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Legal Transplantation: The Diffu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Issue 4, 2014, pp.781-792.

⑤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2, 2004, pp.239-275; Xiaoyu Pu, “Socialis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4, 2012, pp.341-367; 吴文成:《从扩散到竞争:规范研究纲领的问题转换与理论进步》,载《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第27—39页。

扩散。由此,传统的多边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将朝着发达国家规划的方向产生不可逆的改变。^①换言之,许多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研究倾向于认为,量变的积累(即发达国家持续不断地实施场所转移策略)将引发质变(即新规则取代传统多边规则)。还有一些实证研究指出,不应仅以包含新规则协定的数量判断新规则的传播效果,而应同时关注发展中国家是否主动推广有关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在国际舆论中受到支持的程度。还是在知识产权领域,有研究就认为西方大国只能推动部分发展中国家暂时接受 TRIPS-Plus 规则,但这些国家多数未能成为新规则的积极推广者,而且针对新规则的反制行动也经常出现。^②

既有研究较好地归纳了场所转移策略的运行逻辑,本文也接受场所转移策略能放大发达国家相对于互动对手的优势从而推动新规则扩散的论断。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既有文献普遍认同场所转移策略能更有力地推动新规则传播,然而既然对场所转移策略将造成长期和不可逆系统性改制效果的论断在实证层面仍有争议,我们就应深入讨论该策略是否(或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有效推动新规则支持者和推广者阵营的持续扩大。其次,许多文献存在夸大场所转移策略影响力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深入分析引导和劝说行动的局限性,简单地认为只要量变不断累积就一定会引发质变。如后文将详细讨论的,传统规则体系持续深度的变革需要以各国转变对相关规范的认同为基础,而接受新规则国家数量的简单增加并不一定意味出现了认同的普遍性转变。引导机制只能催生目标国的机会主义行动,无法改变其认知。同时,场所转移策略并不能充分强化劝说行动的效用,更多的只是起到抑制目标国反思的效果。因此,场所转移策略所引发的规则变革具有不稳定性,其长期效果需要其他机制的支持。最后,那些注意到场所转移策略长期效果不稳定性的文献一般将该策略的制约机制归为知识界对新规则不合理、不合法特性的批判。^③然而,这些价值维度上的批判往往自新规范和新规则诞生之初就已存在,却仍未阻止它们在场所转移策略的推动下发生初步扩散。由此可见,若场所转移策略在取得初步成功后反遭制约,应该还

① 对这种观点的讨论或总结,参见张建邦:《“TRIPS-递增”协定的发展与后 TRIPS 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7—25页;董涛:《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结构演进与变迁——后 TRIPS 时代国际知识产权格局的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12期,第21—38页;Gaëlle P. Krikorian and Dorota M. Szymkowia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Making: The 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sions in US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Access to Medicine,”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10, No.5, 2007, pp.388-418.

② Jean-Frédéric Morin, “Multilateralizing TRIPS-Plus Agreements: Is the US Strategy a Failure?”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12, No.3, 2009, p.178.

③ Jean-Frédéric Morin, “Paradigm Shift in the Global IP Regime: The Agency of Academ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1, No.2, 2014, pp.275-309.

有比外部批评更强的制约机制。针对这些问题,下文将进一步明确场所转移策略的独特规则改革效用及其边界,突出新规则在长期实践中的治理绩效对其传播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决定性影响,并讨论规则制衡行动的干预性影响。这一分析框架更好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动性,也有助于我们避免过度延展场所转移策略的影响力。

三 场所转移策略长期效果的影响因素:治理绩效与规则制衡

从长时段来看,新规则(如 TRIPS-Plus 和碳定价)扩散的广度和持续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对传统规则的规范基础(如“南方优待”规范、将强制减排视为正统治理方法)的认同是否发生了改变。只有认同发生变化,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才会从新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推广者,规则扩散的网络效应才会出现。虽然现实中在对传统规范基础的认同不变的情况下新规则也可能发生扩散,但这很可能只是发达国家不断投入物质性诱惑而发展中国家采取机会主义行动的结果。一旦发达国家的投入力度减弱,规则扩散就会丧失动能甚至发生逆转。^①而在促进认同变化方面,场所转移策略体现出独特却有限的价值:一方面,该策略包含的引导和劝说行动能够在短期内抑制争论,降低传统规范基础认同对新规则的抑制效应,促使目标国给予新规则“落地”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得到初步扩散之后,其进一步发展将不再仅凭场所转移策略就能够获得支持,而是需要新规则产生持续的积极治理绩效。同时,规则制衡行动总会对场所转移策略的改制效果构成牵制。

(一) 场所转移策略的规则改革效用及其边界

如果说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效果取决于规则推广行动能否增强国际社会成员对新规则和新规范的认同,那么引导机制作为理性主义的规则推广机制显然只具有短期效果。引导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强迫或利益交换来改变目标国的行为,这种“结果性逻辑”并不能改变后者对“适当行为”的认知。^②即便发达国家可以利用权力优势促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规则,但后者完全可以只在前者的互动中展现出积极姿态,而在同其他国家的互动中保持消极态度。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无法为规则扩散提供持续动力。

^①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4, 2005, p.804; Glenn Chafetz, Benjamin Frankel and Michael Spirtaz, eds., *Origins of National Interests*, Ox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p.211-212.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69.

场所转移策略能否产生认知层次的影响?答案是肯定的,但并非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主要依靠成功说服目标国来转变其认知。这些研究讨论的劝说行动无非是一般性的话语互动,它们难以解决一个悖论:发达国家之所以需要使用场所转移策略,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难以被打破的传统规范和规则体系;发展中国家也不是被动地接受规范,而是具有一定的反思性和能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同样的劝说活动无法在多边场合促成认知改变,而在新场所就可以?对这一悖论的最合理解释是:场所转移策略的独特价值事实上并不在于扭转目标国对传统规范基础的认同,而只是强化了不确定性和紧张情境,促使目标国对新规则采取更加开放的立场。在多边谈判中,发达国家之所以难以推动规则改革,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传统规则及其背后规范的立场是高度确定的。这种确定性主要是基于集团的力量: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构成了一个实践共同体,其内部成员不断分享和强化共同知识和话语,并通过与发达国家集团的对抗式互动强化了本集团内部立场的一致性。^①如在多边气候谈判中,“南方优待”规范在多边谈判的说辞和文本拟订过程中得到反复实践,因而具备高度的合法性并深刻影响了气候治理规则的内容。^②这种对传统规范基础的认同使新规则没有机会落地。

场所转移策略可以打破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谈判场合中对传统规范基础原有的确定性认知,降低目标国的反思性。第一,在离开谈判集团的立场协调和政治支持后,单个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和警觉性显著下降,这给发达国家的劝说行动提供了机会。第二,作为双边和复边谈判的议程设置者,发达国家会刻意将新规则暗藏于新的技术性议题中。如在气候俱乐部中,发达国家刻意忽略“南方优待”规范,转而将谈判重心放在如何进行“自愿”跨国技术合作上。^③这样,新的谈判焦点避免了各方围绕权利义务分配的规范性争论,使发达国家得以掩盖新规则的矛盾性。第三,与话语维度的劝说行动相配合,发达国家还通过捆绑利益和使用政治权威等引导机制制造时间压力和竞争压力。正是在这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发达国家才可以宣称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确定的收益(如贸易协定带来的市场准入和技术援助许诺)、不确定的损失以及收益可能随时流失的压力,因而需要快速决策。这样,目标国做出审慎成本—收益分析

①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ed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7.

② Jutta Brunnée and Stephen J. Toope,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n Interactional Accou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 4.

③ Bowen Yu, Steven Bernstein and Matthew Hoffmann, “Building Durable Climate Clubs: Lessons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PP and CEM,”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19, Issue 2, 2021, pp.117-124.

的可能性便会降低,新规则也就争取到了生存空间。

诚然,场所转移策略在认知维度上的独特功能对新规则的初步传播至关重要。没有场所转移策略作为第一推动力,新规则在提出伊始就将因与传统规范和规则相抵触而遭到打压,失去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的机会。^①但从逻辑上看,通过降低和抑制目标国的反思而达成的认知转变必然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各国对新规则认知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从怀疑到尝试再到采纳的过程。^②如前文所述,场所转移策略只能降低怀疑、促进尝试,却无法决定各国是否采纳新规则。从长期来看,最终决定新规则是否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并不是其推广者持续不断的引导和劝说行动,而是新规则及其背后规范本身的性质,这超越了场所转移策略的影响力范围。传统建构主义规范传播研究之所以倾向于认为规范在得到初步接纳后便会相对线性地扩散,主要是因为此类研究默认新规范在道义和实践维度都比旧规范更具优势,只是这些新规范原本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但事实上,新规范并非一定优于旧规范。在如何衡量规范优劣上,一些研究尝试进行价值判断,认为“好规范”符合国际公益且内在逻辑一致,而“坏规范”只服务少数国家的利益且存在内在矛盾和双重标准。^③这种价值维度的二分法过于理想化:一种规范和规则的优劣往往并不是被提出之初就已经确定的,此时它们并不具有确定无疑的内在逻辑缺陷,各方很难对其性质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这些规范与规则的推广者也会拿出大量论据支持规范的合法性和潜在有效性。因此,在场所转移策略已经增大了规则推广者话语权的情况下,人们对刚提出的新规范和新规则的认识极有可能处于模糊状态。^④毕竟对于确定无疑的坏规范,无论推广者如何引导和劝说其也不太可能得到传播。因此,虽然新规范和新规则被提出之初受到场所转移策略的庇护,但从长期来看,真正影响各方认知的是新规则进入实践后的运行情况。

(二) 新规则的治理绩效与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改制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说明,实践是决定新规

^① 余博闻:《“改革方法论”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0期,第111—113页。

^② Bowen Yu, “Cognitive Evolution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4, No.4, 2021, p.487.

^③ Ryder McKeown, “Norm Regress: US Revisionism and the Slow Death of the Torture Nor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3, No.1, 2009, pp.5–25; Amitav Acharya, “Norm Subsidiarity and Regional Orders: Sovereignty, Regionalism, and Rule-Making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1, 2011, pp.95–123.

^④ Betsy Jose, *Norm Contestation: Insights into Non-Conformity with Armed Conflict Norms*, Cham: Springer, 2017, pp.27–28; 山秀蕾、刘昌明:《人权规范的扩散与异化》,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4期,第85—108页。

范和新规则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选择机制。实践理论指出,实践既是社会化机制,也是变革机制。^① 在场所转移策略使新规范和新规则获得初步发展空间之后,在实践中产生积极绩效的新规范和新规则将不断融入行动者的背景知识。通过实践,新规则的积极绩效不断显现,从而使越来越多最初持怀疑态度的行为体转变认知成为新规则的践行者,规则背后规范的认同者最终成为规则的传播者。换言之,产生积极绩效的实践可以使采用新规范和新规则的实践共同体不断扩张,最终替代支持传统规范和规则的实践共同体,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便完成了认知演化。^② 以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为例,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多边外气候治理实践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气候治理路径并不一致。从规范视角来看,传统气候治理路径以自上而下的全球缔约为正统治理方法,而多边外气候治理实践具有自下而上、非强制和柔性的特征。由于多边外气候治理能够产生积极的治理绩效,这类实践仍能不断发展,并最终跻身于全球气候治理主流方法之列。^③ 这一案例表明,新规则在获得初步实践机会后若能展示良好治理绩效,就将持续扩散。需要强调的是,对新规则实践绩效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场所转移策略不重要。新规则在扩散之初仍需要场所转移策略为其保驾护航,毕竟此时新规则的性质往往相对模糊,吸引力也比较弱,可能面临强大的传统规范和规则的打压。^④

新规则并不总是对广大行为体都有好处。当场所转移策略所推动的新规则在落地后的政策试验中无法产生积极治理绩效甚至产生负面治理绩效时,实践可能成为阻止它们持续扩散的机制。认知演化理论指出,负面治理绩效会对规范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冲击。即使是那些被高度内化的规范,也可能在产生负面治理绩效的情境下被重新审视,^⑤更不用说场所转移策略只是通过规避争论和抑制反思的方式推动规则及其所包含规范的暂时性扩散。实践将不断向新规范和新规则已有的和潜在的接受者展现其负面治理绩效,揭示其在传播早期被掩盖的缺陷。随着负面治理绩效不断出现,新规则将遭到多方批评和质疑。对新规则的质疑性话语和批判性研究越多,单个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互动时就将接收到越多的警示信息,其反思性和警惕性也会大为增

①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ed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p.15-16.

② Emanuel Adler, *World Ordering: A Social Theory of Cognitive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chapter 6.

③ 余博闻:《认知演化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变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101—133页。

④ 如果传统规范和规则已然衰落,则场所转移策略的必要性也会降低。

⑤ Sebastian Schmidt,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and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A Pragmatist Explanation of Norm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8, No.4, 2014, p.820; Emanuel Adler,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4, p.73.

强。当然,在讨论反思性上升时应注意两点:其一,对实践绩效的评估高度取决于共同体成员的解读,解读结果往往受成员间辩论和共同体内权威成员的影响。拥有认知性权威的行为体可能延缓或加速人们关于治理失败共识的形成,从而影响其反思性。^①除国家外,由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跨国知识共同体对总体反思性的提升也非常重要。^②其二,即使体系层次的反思性上升,也不必然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会具备相同程度的反思性,具体国家的反思性可能取决于其国内政策环境。

政策反思的直接后果是规则扩散动力的衰减。随着新规则实践产生初步的负面治理绩效,早期接纳者将很难有意愿充当推广者。同时,新规则的其他目标受众在注意到新规则日益暴露的缺陷后也会更加审慎地处理与新规则的关系,在双边互动中倾向于抵制发达国家的倡议。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小布什政府试图在“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这一气候俱乐部内采用市场化的低碳技术合作代替减排行动,但由于相关合作实践没有产出预期的环境效益,该气候俱乐部难以继续扩大且以致失败。^③

(三) 规则制衡行动对场所转移策略的制约

场所转移策略在长期运行中面临的另一个制约是规则制衡行动。场所转移策略虽能在一段时期内抑制目标国的反思性,但无法阻止非目标国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它们一般是传统规范最坚定的支持者)发起规则制衡行动。制度竞争理论指出,在不同政治权力的支持下,各种制度之间可能会展开竞争。^④建构主义规范研究也指出,缺乏强制性权力的行为体可以通过辩论和平行实践建构它们所青睐规范的支持力量。^⑤针对场所转移策略的规则制衡行动往往呈现为四种形式:第一,场所转移策略的反对者可以采用辩论行动,批评场所转移这一规则改革方法本身,号召各国不参与场所转移谈判,强调多边谈判的正统性。例如,随着小布什政府建构气候俱乐部的行动遭到国际法学界的批评,一些非政府组织呼吁反对以气候俱乐部代替多边气候谈判。^⑥第二,场所转移策略

① Jacqueline Best, “When Crises Are Failures: Contested Metric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10, No.1, 2016, pp.39–55.

② Jean-Frédéric Morin, “Paradigm Shift in the Global IP Regime: The Agency of Academics,” pp.275–309.

③ Bowen Yu, Steven Bernstein and Matthew Hoffmann, “Building Durable Climate Clubs: Lessons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PP and CEM,” pp.117–124.

④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59页。

⑤ 何银:《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105—121页; Alan Bloomfield, “Norm Antipreneurs and Theorising Resistance to Normative Chan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2, No.2, 2016, pp.310–333; Jeremy Youde,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er-Epistemic Community: AIDS, South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4, 2005, pp.421–439.

⑥ Tora Skodvin and Steinar Andresen, “An Agenda for Change in US Climate Policies? Presidential Ambitions and Congressional Power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9, No.3, 2009, pp.263–280.

的反对者可以在话语上强调现状的合理性以及新规范和新规则的缺陷,从而阻滞其扩散。这一策略已被发展中大国用于制衡西方式“保护的责任”规范的传播。^① 第三,发展中大国可以在多边谈判场合外尝试建构以传统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双边和复边谈判和缔约,将原本限于多边场域的规范协调实践拓展开来,形成对发达国家的制衡。只要围绕传统规范和规则的谈判以及缔约实践继续大范围开展,传统规则的合法性就能被不断确认,而不会轻易被新规则取代。^②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也可通过提供区域性俱乐部物品的方式对冲发达国家场所转移策略的物质性诱惑。^③ 第四,场所转移策略的反对者也可以更主动地建构它们自己的地方规范和非中性规则。如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言,发展中国家有时会出于报复霸权国虚伪双标、将发展中国家排斥在规范建构过程之外的考虑,建构替代性的地方规范削弱霸权国所提出规范的合法性。^④

需要强调的是,规则制衡行动在抑制新规则传播方面的效果取决于新规则的治理绩效。毕竟发展中大国在提供物质利益方面的能力上要逊于发达国家,它们所依赖的主要规则制衡手段还是说辞辩论。由于在场所转移策略的推动下新规则至少能够获得初步传播,从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纳入试验性治理实践。如果这些新规则在初步试验中被证明能够产生积极的治理绩效,则发展中大国说辞的有效性就会大大降低。^⑤ 只有当新规则在实践中产生了负面治理绩效时,规则制衡行动才能对场所转移策略产生更有效的制约。

综上,场所转移策略对于打破僵局并推动新规则初步扩散至关重要。若不使用场所转移策略,新规则可能没有机会得到后续实践的检验。但该策略的效果本质上是短期的,新规则的长期效果并不取决于场所转移策略本身的运行,而是取决于其在实践中的绩效同时受规则制衡行动的干预性影响(如图1)。简言之,场所转移策略能有力地推动新规则扩散,但无法长期支持产生负面治理绩效的新规则发展。这一论点有助于我们认清场所转移策略在推动国际规则改革时的价值和局限性,区分哪些规则改革效果是场所转移策略直接引发的,哪些规则改革现象已经超出了该策略的影响力范畴。

下文将分别分析知识产权治理领域 TRIPS-Plus 规则和气候领域碳定价规则的扩

① 陈拯:《规范阻滞及其策略——以中俄等在“保护的责任”演进中的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6期,第65—90页。

② 这种通过反复实践确认规范在国际立法过程中的合法性的机制已经被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所证实,参见 Jutta Brunnée and Stephen J. Toope,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n Interactional Accou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59页。

④ Amitav Acharya, “Norm Subsidiarity and Regional Orders: Sovereignty, Regionalism, and Rule-Making in the Third World,” pp.95–123.

⑤ 刘宏松、吴桐:《国家间论辩、关键节点与国际制度改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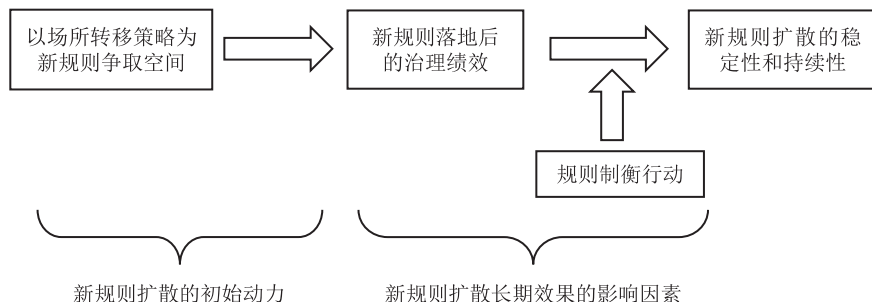


图1 场所转移策略与国际规则改革的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散。这两个案例具有两点相似性:第一,它们都涉及由发达国家主导建构规则的传播,且这些规则在提出之初都存在一定的规范性争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第二,发达国家在推广新规则时都采用了场所转移策略,将多边谈判转移到双边互动,并综合运用了引导和劝说行动,成功地推动了新规则的初步传播。但这两个案例在规则扩散的长期效果上存在明显不同:TRIPS-Plus 规则的扩散出现了动能衰竭;碳定价规则却被主要大国接受,成为当今气候治理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对这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既能够更好地展示场所转移策略在规则扩散初期的有效性,又能够反映其长期效果如何受到新规则治理绩效的决定性影响。

四 TRIPS-Plus 知识产权规则的不稳定扩散

当前通行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基于各国于 1994 年签订的 TRIPS。TRIPS 虽然更多反映了发达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切身利益,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方优待”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责任方面规定了例外规则(如允许有条件的药品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等),还在具体保护程序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过渡期和部分自由立法权等。^① TRIPS 生效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便一直希望升级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具体包括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如将更多客体纳入保护范围,将选择性保护对象变为必须保护对象)、提高保护标准(如延长保护期)、加强执法措施以及为弹性和例外条款的适用施

^① 相关研究参见 Peter K. Yu, “TRIPS and Its Discontents,” *Marquet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Vol.10, Issue 2, 2006, pp.389-392; Mohammed El Said, “Radical Approaches During Unusual Circumstan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 and the COVID-19 Dilemma,” *Development*, Vol.63, No.2, 2020, pp.209-218;薛虹:《知识产权准多边国际体制的扩张》,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第 43 页。

加更多限制(如缩短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和限制仿制药强制许可的应用条件)等。^① 由于美国与欧洲国家推动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在很多方面超出了 TRIPS 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学界将这些规则统称 TRIPS-Plus 规则。TRIPS-Plus 规则与 TRIPS 所包含的“南方优待”规范不符,因而在多边场合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发展中国家不但成功阻止了发达国家将提升专利和商标保护纳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②还于2001年推动达成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宣言》(简称《多哈宣言》),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不应损害各国的公共健康利益,赋予各国更多使用强制许可等灵活条款的权利。^③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与欧洲国家开始运用场所转移策略,谋求在双边和复边自由贸易谈判中推动 TRIPS-Plus 规则的扩散,从而在排斥利益攸关方普遍参与和监督的情况下重塑知识产权规则体系。这些行动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1995—2016年,共有117个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了 TRIPS-Plus 规则。^④ TRIPS-Plus 规则还开始出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等复边协定中。然而,TRIPS-Plus 规则扩散的效果并不稳定:首先,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推动。1995—2016年签订的117个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有90个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占总数的77%。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间签订了251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超过88%不包含 TRIPS-Plus 规则。^⑤ 由此可见,

① 对 TRIPS-Plus 规则内容的既有研究主要来自国际法文献,典型研究参见 Susan K. Sell, “TRIPS Was Never Enough: Vertical Forum Shifting, FTAs, ACTA, and TPP,”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Vol.18, Issue 2, 2010, pp.447-478; Meir P. Pugatch,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IPRS in a TRIPS and TRIPS-Plus World,”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Vol.6, No.3, 2005, pp.431-465; Beatrice Lindstrom, “Scaling Back TRIPS-Plus: An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sions in Trade Agree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Y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42, 2010, pp.917-980; 张建邦:《“TRIPS-递增”协定的发展与后 TRIPS 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8页;梁志文:《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药品 TRIPS-Plus 保护》,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5—140页。

②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Jenny Surbeck, “Mapping the New Frontier of International IP Law: Introducing a TRIPS-Plus Dataset,” *World Trade Review*, Vol.19, No.1, 2020, p.110.

③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in01_e/mindecl_trips_e.htm, 访问时间:2022年9月25日。

④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Jenny Surbeck, “Mapping the New Frontier of International IP Law: Introducing a TRIPS-plus Dataset,” p.111.

⑤ 文中涉及 TRIPS-Plus 规则扩散的数据由笔者根据莫林等的原始数据库计算得出,参见“Morin and Surbeck Supplementary Material,”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world-trade-review/article/abs/mapping-the-new-frontier-of-international-ip-law-introducing-a-tripsplus-dataset/83396FD4CAD333E4A95D08F29DC886DE#supplementary-materials>, 访问时间:2022年6月23日。笔者计算时所定义的“发达国家(集团)”包括欧盟(统计时间范围内包括英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现有成员国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冰岛(其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但也有单独行动记录)和以色列。

当没有发达国家参与时,发展中国家往往不会选择在自由贸易谈判中纳入 TRIPS-Plus 规则。其次,美国与欧洲大国推动 TRIPS-Plus 规则扩散的能力远强于其他发达国家。1995—2016 年,美国与欧洲之外的发达国家(如日本)签订的 69 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只有不到 38%(26 个)包含 TRIPS-Plus 规则,远低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水平(约 69%)。即便在这些国家签订的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中,TRIPS-Plus 规则的具体数量(每个协定约 10 条)也低于前者(每个协定约 18 条)。最后,美国的规则推广行动也会遭受相当的阻力。由美国主导的《反假冒贸易协定》虽然有 10 个发达国家签署,但只有日本正式批准了该协议。TPP 中虽包含大量 TRIPS-Plus 规则,但在美国退出后其替代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搁置了众多知识产权条款。综上,时至今日,在自由贸易谈判中纳入 TRIPS-Plus 规则没有被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而美国与欧洲之外的发达国家也并不总能成功推动这一新规则的传播。如何理解这些现象?本文认为,TRIPS-Plus 规则的初步扩散是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充分反思的情况下实现的。随着各国对 TRIPS-Plus 规则现实绩效越来越深刻的政策反思以及发展中大国开始采取规则制衡行动,美国与欧洲大国的规则推广行动逐渐受到制约。

(一) 自由贸易谈判与 TRIPS-Plus 规则的初步扩散

2001 年以来,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建构方面的工作重点从多边谈判转移到双边自由贸易谈判。^① 欧盟自 2006 年起追随美国步伐开始强调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改制功能。^② 在场所转移策略下,发达国家综合运用引导和劝说机制,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对传统“南方优待”规范的认同,鼓励了机会主义行为。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规则推广行动首先利用了 TRIPS-Plus 规则实践绩效的不确定性。尽管在 21 世纪初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相关规则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利益,但由于 TRIPS-Plus 规则影响的滞后性,^③当时扎实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同时,将 TRIPS-Plus 规则与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绑定后,人们并不清楚这种不确定的损失可否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的收益进行弥补。在多边场合,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所坚持的共同身份尚能促使各国抵制 TRIPS-Plus 规则,但在双边场合各国具备更大的自

^① Robert B. Zoellick, “Free Trade and Hemispheric Hope,” http://ctr.c.sice.oas.org/geograph/westernh/zoellick_3.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0 日。

^② Josef Drexler, Henning Grosse Ruse-Khan and Souheir Nadde-Phlix, eds., *EU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Better or Worse?*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③ 有研究曾提出,美式 TRIPS-Plus 规则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可能要到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15 年后才能显现。参见 Sanya Reid Sm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Penang: Third World Network, 2008, p.14。

由裁量空间。^① 发达国家借此机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项目,试图使参与过相关培训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更认同“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理念。例如,美国专门设立了全球知识产权学院来传播美式知识产权知识和理念。^② 此外,多数双边自由贸易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公众、非政府组织和相关研究者往往无法获取充分信息,也就无法科学和审慎地评估其利弊,这与多边谈判所提供的多种信息和影响渠道形成反差。^③ 事实上,即使是在全部由发达国家参与的《反假冒贸易协定》谈判中,美国也极力避免向公众公开谈判细节,以回避大范围的辩论。^④ 正是借助这些有利条件,发达国家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有效地塑造话语,片面强调自由贸易协定的好处,并刻意淡化 TRIPS-Plus 规则的潜在负面影响。

在模糊化 TRIPS-Plus 规则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引导机制进一步鼓励了发展中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在政治上易受美国影响的国家,美国往往直接施压迫使其接受 TRIPS-Plus 规则。例如,美国通过将安全保障与 TRIPS-Plus 规则绑定的方式,成功说服新加坡在自由贸易谈判中对美让步。^⑤ 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谈判中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吸引力,通过向目标国做出开放市场、给予技术援助和加大投资等承诺换取其接受 TRIPS-Plus 规则。^⑥ 在发达国家的引导下,那些作为新规则早期接受者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低估 TRIPS-Plus 的负面影响,并高估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收益。一些国家在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中甚至根本不重视知识产权议题。例如,在 2000 年美国 and 约旦的自由贸易谈判中,约旦对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价值估计很高,但其决策者既没有充分讨论 TRIPS-Plus 规则可能给约旦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未就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问题广泛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约旦决策者轻易接受了美国“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能够吸引商业、高科技和投资”的

① 朱京安、王鸣华:《TRIPS-plus 扩张的新制度经济学解析》,载《知识产权》,2014 年第 11 期,第 95—100 页。

② Duncan Matthews and Viviana Munoz-Tellez, “Bilateral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IP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9, No.6, 2006, pp.629–653;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Edward Gol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Legal Transplantation: The Diffu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781–792.

③ Frederick M. Abbott, “The WTO Medicines Decision: World Pharmaceutical Trade and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9, No.2, 2005, p.354.

④ Susan K. Sell, “TRIPS Was Never Enough: Vertical Forum Shifting, FTAs, ACTA, and TPP,” pp.456–457.

⑤ Eul-Soo Pang, “Embedding Security into Free Trade: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9, No.1, 2007, pp.1–32.

⑥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Edward Gol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Legal Transplantation: The Diffu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781–792.

说辞。^① 与约旦类似,许多阿拉伯国家在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中普遍将知识产权问题视为贸易谈判中的非重要事项,乐于用知识产权方面的妥协换取经济利益。^② 又如,欧盟与加勒比论坛(CARIFORUM)国家签订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EPA)中包含大量 TRIPS-Plus 规则,但加勒比论坛国家并不十分在意在知识产权规则方面对欧盟的妥协,而是认定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利益会轻易弥补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③

(二) 政策反思与 TRIPS-Plus 规则扩散动力的衰减

虽然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场所转移策略取得了初步效果,但随着 TRIPS-Plus 规则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实践,其对后者公共福利和发展利益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发展中国家开始不再盲目跟从。

首先,TRIPS-Plus 规则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利益。自 2005 年起,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开始讨论与提升药品专利保护相关 TRIPS-Plus 规则可能对公共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④ 2006 年,《世界卫生组织公报》发文详细讨论了 TRIPS-Plus 规则(如专利期延长和数据专属权等)与传统 TRIPS 规则的差异,并预测这些规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药品价格上涨。^⑤ 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的一项报告显示,约旦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数据专属权保护规则使约旦的药品消费增加了至少 630 万美元。一些新药在约旦的价格是在埃及(当时不受 TRIPS-Plus 规则约束)的 2—6 倍。^⑥ 有研究指出,美国与哥伦比亚自由贸易谈判中

① Mohammed El Said, “Morning After: TRIPS-Plus, FTAs, and Wikileaks: Fresh Insigh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P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28, 2012, p.81, pp.92-93.

② Mohammed El Said, “The European Trips-Plus Model and the Arab World: From Co-Operation to Association: A New Era in the Global IPRS Regime?” *Liverpool Law Review*, Vol.28, No.1, 2007, p.156.

③ Josef Drexler, Henning Grosse Ruse-Khan and Souheir Nadde-Phlix, eds., *EU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Better or Worse?* pp.139-140.

④ Carsten Fink and Patrick Reichenmiller, “Tightening TRIP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sions of Recent US Free Trade Agreements,” <https://www.iprsonline.org/unctadictsd/dialogue/2006-07-31/12.TradeNote20Fink.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0 日;Ruth Mayne, “Regionalism, Bilateralism, and ‘TRIP Plus’ Agreements: The Threa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https://hdr.undp.org/content/regionalism-bilateralism-and-trip-plus-agreements>,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0 日。

⑤ Carlos Maria Correa, “Implications of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Access to Medicin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84, Issue 5, 2006, pp.399-404.

⑥ Oxfam International, “All Costs, No Benefits: How Trips-Pl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in the US-Jordan FTA Affect Access to Medicines,” <https://oxfamlibrary.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114080/bp102-all-costs-no-benefits-trips-210307-en.pdf%3Bjsessionid%3D089750820CF675173F0C3204C369D63F%3Fsequence%3D1>,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4 日。

的 TRIPS-Plus 规则将对哥伦比亚的医疗系统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到 2020 年,哥伦比亚的药品采购花费将增加 9 亿美元以上。^① 这些研究给出的量化分析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对于 TRIPS-Plus 规则负面治理绩效的认识。

其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价值在于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美国宣扬“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毫无疑问地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但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可能与很多变量有关,没有任何决定性证据能证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反,日本和韩国的科技进步以及印度制药业的发展恰恰得益于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② 乐施会报告发现,约旦制药业获得的直接投资并没有像美国声称的那样在新协定签订后将迎来增长,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也未如美国描绘的那样推动约旦制药企业增加研发投入。^③

如果说在场所转移策略实施之初一些发展中国家将知识产权议题视为非重要事项的话,那么后来者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显然更加重视知识产权规则的潜在负面影响。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泰国在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时的选择。在两国谈判伊始,便有泰国非政府组织和学者批评美国在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提议将对泰国公共卫生治理造成不利影响。^④ 泰国高校与药品协会的联合研究成果预测,如果接受美国提议的专利保护期延长条款,那么到 2027 年泰国药品价格指数将上升 32%。^⑤ 世界银行 2006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若泰国政府继续实施药品强制许可制度到 2025

① 这项研究被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报告收录,参见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and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UNAID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Public Health,” <https://hivlawcommiss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The-Potential-Impact-of-Free-Trade-Agreements-on-Public-Health-Issue-Brief.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7 日。

② Dean Baker, Arjun Jayadev and Joseph Stiglitz,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 <https://cepr.net/images/stories/reports/baker-jayadev-stiglitz-innovation-ip-development-2017-07.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7 日;John Hudson and Alexandru Minea,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Unifie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46, 2013, pp.66–78。

③ Oxfam International, “All Costs, No Benefits: How Trips-Pl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in the US-Jordan FTA Affect Access to Medicines,” <https://oxfamlibrary.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114080/bp102-all-costs-no-benefits-trips-210307-en.pdf%3Bjsessionid%3D089750820CF675173F0C3204C369D63F%3Fsequence%3D1>,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4 日。

④ “Thai Civil Groups Want IP off Trade-Talks Agenda with U.S.,”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835,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9 日。

⑤ Nusaraporn Kessomboon, et al., “Impact on Access to Medicines from TRIPS-Plus: A Case Study of Thai-US FTA,”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Vol.41, No.3, 2010, p.673; Chutima Akaleephan, et al., “Extension of Market Exclusivi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Accessibility to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Drug Expense in Thailand: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rips-Plus Proposal,” *Health Policy*, Vol.91, No.2, 2009, pp.174–182。

年,则该国的医疗开支将节省 32 亿美元。^① 此外,药品强制许可也是泰国一些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政策工具。泰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甚至一些美国学者都认为 TRIPS-Plus 条款将对泰国政府的传染病防治能力产生负面影响。^② 这种对 TRIPS-Plus 规则的高度关注与在早期自由贸易谈判中约旦等国对知识产权问题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公共卫生方面的考量使得泰国拒绝了美国提高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要求,这导致美泰自由贸易谈判陷入长期停滞。^③ 这一案例展示了在各方的高度关注下,发展中国家完全能够合理估计 TRIPS-Plus 规则的危害并抵制美国的压力。除泰国外,哥伦比亚和秘鲁等一度退出与美国自由贸易谈判的国家在重启谈判后获得了更为宽松的知识产权条款,并被允许在正式协议中强调维护本国的公共健康利益。^④

在对 TRIPS-Plus 规则保持警惕的氛围中,规则扩散动能开始衰减。那些很早便与美国或欧洲国家签订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并未成为该规则的坚定推广者。例如,约旦在 2000 年与美国签订了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此后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均不包含 TRIPS-Plus 规则。此外,在 TPP 谈判中各国就知识产权问题展开“拉锯战”,甚至连新西兰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提出 TRIPS-Plus 规则(如美国提出的超长数据专属权期限)将限制各国的创新能力,影响其食品与药品的获取,从而影响总体经济发展。^⑤ 美国采取了保密谈判和重点施压等方式才勉强促成包含相关规则的 TPP 通过。^⑥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之后,CPTPP 谈判的领导者日本无力推动 TRIPS-Plus 规则的相关谈判,最终各方选择了搁置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内容。

(三) 规则制衡行动对美欧改制议程的进一步制约

随着美国强行推动 TRIPS-Plus 规则的意图愈加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有意

① Ana Revenga, et al., *The Economics of Effective AIDS Treatment: Evaluating Policy Options for Thailand*,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6, p.169.

② Jakkrit Kuanpoth, “TRIPS-Pl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Impact on Thailand’s Public Health,”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9, No.5, 2006, pp.573–591; Charles T. Collins-Chase, “The Case Against TRIPS-Plus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ing AIDS Epide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9, Issue 3, 2008, pp.763–802.

③ Beatrice Lindstrom, “Scaling Back TRIPS-Plus: An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sions in Trade Agree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pp.975–976.

④ Jean-Frédéric Morin, “Multilateralizing TRIPS-Plus Agreements: Is the US Strategy a Failure?” p.191.

⑤ Susan K. Sell, “TRIPS Was Never Enough: Vertical Forum Shifting, FTAs, ACTA, and TPP,” p.465.

⑥ 丛立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知识产权谈判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载《国际论坛》,2014 年第 5 期,第 46 页。

识地在各种场合寻求对包含 TRIPS-Plus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制衡。此类规则制衡行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发展中国家继续在多边场合中不断重申 TRIPS 原始协议所体现的“南方优待”规范。2006 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卫生部部长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拒绝过度采用与医药有关的 TRIPS-Plus 规则。^① 2007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建立了“发展议程”项目,进一步将知识产权谈判重点转向关注药品、信息和种子等与发展相关的资源获取的便利化。秘鲁和多米尼加等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也支持这项改革。^② 在《反假冒贸易协定》签订后,中国和印度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 TRIPS 理事会会议上多次对该协定进行了严厉批评。^③ 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和相关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施压下,欧洲议会于 2012 年否决了《反假冒贸易协定》。^④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期,印度、南非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发起多边倡议,要求取消新冠疫苗专利保护或至少保障各国可以通过合理方式获取新冠疫苗。^⑤

第二,在双边和复边自由贸易谈判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不断重申公平灵活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重要性。^⑥ 中国总体上更青睐灵活的软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并强调公共健康利益,不主张在商标、专利和版权等领域做出过多妥协。^⑦ 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更是体现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方面对传统的灵活性原则的重视:日本和韩国在谈判中试图将在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中作为可选义务的“销售许可时间补偿”规则转变为强制性义务。这显然将延长药品的专利期,是一个典型的美式 TRIPS-Plus 规则。对此,中国和

① “Declaratoria de Ministras y Ministros de América del Sur sobre Propiedad Intelectual, Acceso a los Medicamentos y Salud,” <https://rebelion.org/declaratoria-de-ministras-y-ministros-de-america-del-sur-sobre-propiedad-intelectual-acceso-a-los-medicamentos-y-salud/>,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9 日。

② Jean-Frédéric Morin, “Multilateralizing TRIPS-Plus Agreements: Is the US Strategy a Failure?” p.184.

③ “Council Debates Anti-Counterfeiting Talks, Patents on Life,”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0_e/trip_08jun10_e.htm,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9 日;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ncil Discusses Anti-Counterfeiting Pact, Tobacco Packaging,”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2_e/trip_28feb12_e.htm, 访问时间:2022 年 9 月 29 日。

④ 《联合国健康权问题专家欢迎欧洲议会否决〈反假冒贸易协议〉》,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2/07/176562>, 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25 日。

⑤ 易继明:《后疫情时代“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博弈》,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 年第 5 期,第 163—177 页。

⑥ Wenting Cheng, “China Engages with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ance: The Recent Trend,”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22, No.3-4, 2019, pp.146-161.

⑦ 刘彬:《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文本的体系化构建》,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4 期,第 179—192 页。

印度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表示反对,阻止了日韩两国的倡议。^①

第三,除不断实践传统 TRIPS 规则和弹性条款外,一些发展中大国还尝试将美国和欧洲国家有意回避的商标、专利和版权之外的知识产权议题纳入自由贸易谈判。发达国家的企业是商标、专利和版权相关知识产权的主要所有者,包含这三类知识产权的 TRIPS-Plus 规则占其总数的 60%。^② 而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知识(如中医药和民间艺术)和遗传资源(如种子)等方面的知识产权上更具优势。要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应对这类知识产权议题予以同等重视。但现实中,对发展中国家占优知识产权的保护由于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总是遭到刻意回避。^③ 一些发展中大国已开始对此采取行动。中国与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包含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的条款,中国与东盟、哥斯达黎加、秘鲁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涉及传统知识保护。^④ 中国与瑞士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对中草药赋予硬性保护义务,同时包含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的条款。^⑤ 中国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 TRIPS-Plus 规则的一大重点也在于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保护,而几乎不包含关于商标、专利和版权的 TRIPS-Plus 规则。^⑥ 从规范与规则竞争的视角来看,具有南方特色 TRIPS-Plus 规则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的规则推广效果构成了牵制和对冲。如果发达国家认可场所转移策略中 TRIPS-Plus 规则的正当性,那么它们也应当认可具有南方特色 TRIPS-Plus 规则的正当性,^⑦ 采取双重标准取向拒绝这些规则会动摇其主导的 TRIPS-Plus 规则推广行动的合法性。当然,发展中大国的有关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效果有待观察。

① 张艳梅:《“一带一路”背景下 FTA 药品专利规则的中国选择》,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8 期,第 220 页。

②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Jenny Surbeck, “Mapping the New Frontier of International IP Law: Introducing a TRIPs-Plus Dataset,” p.113.

③ 朱继胜:《“南南联合”构建新型“TRIPS-plus”规则研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6 期,第 174 页。

④ 朱继胜:《“南南联合”构建新型“TRIPS-plus”规则研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6 期,第 184 页。部分条约文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http://fta.mofcom.gov.cn/newzealand/doc/wenben/wenben_12.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11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http://fta.mofcom.gov.cn/Australia/annex/xdwb_11_cn.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11 月 10 日。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 http://fta.mofcom.gov.cn/ruishi/xieyi/xieyizw_cn.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11 月 12 日。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http://fta.mofcom.gov.cn/korea/annex/xdwb_17_cn.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11 月 12 日;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Jenny Surbeck, “Mapping the New Frontier of International IP Law: Introducing a TRIPs-Plus Dataset,” p.116.

⑦ 尚妍:《〈反假冒贸易协定〉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2 期,第 98 页。

五 碳定价规则的持续扩散

碳定价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一种政策工具。其原理是,通过由政府部门设置的碳排放税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碳交易)来形成碳价,使碳排放的成本体现在各类实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碳排放较低的实体能够出售剩余的碳排放配额而直接获益或由于缴纳更少的碳税获得比较优势,这将通过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相关行业进行低碳转型。^① 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首次将碳交易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框架,但在当时碳定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尚遥不可及。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自上而下强制减排这两大核心规范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既不需要承担减排责任,也对用市场化手段推动减排抱有疑虑。^② 在碳定价理念诞生之初,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碳定价是西方塑造碳金融权力并逃脱减排责任的工具,因而应该抵制其成为全球性制度安排。^③ 发展中国家也担忧碳定价和与之相关的排放限额会影响其经济发展。^④ 在此背景下,通过多边谈判直接推动全球碳市场建设缺乏可行性。于是,欧盟率先建成欧洲碳市场(EU-ETS),成为碳定价的先行者。除自身积极行动并继续推动多边气候谈判外,欧盟还同时尝试运用场所转移策略,在双边互动中向选定的发展中国家推广气候治理理念和创新性规则(尤其是碳定价规则)。^⑤ 欧盟的主要策略是在围绕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合作中向发展中国家让利,并与后者开展政策交流和能力建设等双边合作。这些行动比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行动更为柔性,但也属于在多边框架外推广有争议性的新规则。

由于以欧盟为代表的规则推广者双边渠道的努力,碳定价规则得到了广泛和持续的扩散。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发布的报告,全球已建立起71个碳定价机制(包括37个碳税机制和34个碳交易机制),除欧盟、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部分省)等发达国

① 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7, pp.1-2.

② Søren E. Lütken and Axel Michaelowa,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Developing Country Financing for Developed Country Commitment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8, pp.4-8.

③ Donald MacKenzi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rbon Trading,"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29/n07/donald-mackenzie/the-political-economy-of-carbon-trading>,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5日。

④ 对相关观点的总结,参见 Michael Jakob and Jan Christoph Steckel, "How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ould Harm 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Vol. 5, No. 2, 2014, pp.161-168.

⑤ Louise Van Schaik and Simon Schunz, "Explaining EU Activism and Impact in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Is the Union a Norm-or Interest-Driven Acto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0, No.1, 2012, pp.169-186.

家外,中国、墨西哥、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智利、巴西、土耳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建立或正在建设碳定价机制。^① 中国于2011年开始进行碳交易试点,并于2021年初步完成了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建设,中国的碳市场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② 2021年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成为碳定价规则发展的里程碑。在此次大会上,各国批准了建立全球碳市场框架的相关规则,为未来各国碳市场的联通打下了制度基础。^③ 由此可见,碳定价规则的扩散在持续性上表现良好,且已完全融入多边气候制度。与TRIPS-Plus规则类似,碳定价规则的扩散也受益于场所转移策略,且规则扩散初期所依靠的主要机制也是引导和劝说。但在引导和劝说行动的基础上,碳定价规则展现出的积极治理绩效是其不断为各国接纳的重要原因。

(一) 双边气候合作与碳定价理念的初步传播

与知识产权案例类似,以欧盟为代表的碳定价规则推广者在双边场所也大量采取了引导和劝说行动。CDM是欧盟进行新规则推广活动的主要媒介。作为《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CDM允许发达国家政府或私人实体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获得“核证减排量(CER)”,以此抵减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这样,CDM使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义务,同时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④ 欧盟允许在欧洲碳市场中开展交易的实体使用从CDM中获得的CER。^⑤ 由此,对CER的需求主要来自欧洲碳市场,这进一步增强了欧盟在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⑥ 很快,以CDM为基础的一系列双边气候合作得以展开并产生了规则推广效果。

CDM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通过利益诱惑引导发展中国家积极建设低碳经济。CDM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有关项目的实体提供经济收益,引导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

①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2*,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22, pp.15-16.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1年10月)》,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6697.htm,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0日。

③ UNFCCC, “COP26 Outcomes: Market Mechanisms and Non-Market Approaches (Article 6),”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glasgow-climate-pact/cop26-outcomes-market-mechanisms-and-non-market-approaches-article-6>, 访问时间:2022年9月24日。

④ UNFCCC, “What Is the CDM,” <https://cdm.unfccc.int/about/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2日。

⑤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3L0087>,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2日。

⑥ Lucas Merrill Brown, Alex Hanafi and Annie Petsonk,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Results and Lessons Learned,” https://www.edf.org/sites/default/files/EU_ETS_Lessons_Learned_Report_EDF.pdf,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4日。

移,并使相关国家政府获得管理费。这些实际利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项目开发。而随着有关国家从 CDM 中不断获益,其决策者逐渐认识到低碳转型带来的发展机遇。^①

除引导机制外,CDM 也具有社会化目标国的功能:一方面,由于 CDM 项目的建立需要经历开发、运营和监管等步骤,与之配套的私营部门(如作为 CER 主要提供方的清洁能源企业、咨询公司、交易所及审核公司)和政府部门都会被纳入进来。^② 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能力建设项目的支持,各方参与 CDM 的能力获得提升,又进一步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对气候治理和碳定价规则的理解,增强了它们对政策创新的兴趣和信心。^③ 另一方面,围绕 CDM 的合作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绝佳机会。CDM 的运行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参与 CDM 完全出于自愿,这赋予发达国家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此为契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举办了大量研讨会和非正式交流活动,这便于欧盟直接向目标国决策层推广其气候治理新理念和新规则。^④

中国自 21 世纪初开始参与 CDM,并很快成为 CER 的最大供给方。中国与 CDM 的互动很好地体现了前述逻辑:一方面,一大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成功立项并通过出售 CER 获得收益,中国政府也从 CER 交易中收取了可观的管理费。^⑤ 这一引导机制促使中国国内掀起 CDM 项目开发热潮,大量省、市甚至县级政府都积极参与 CDM 项目开发工作。^⑥ 2006 年,通过中国主管机构审批的 CDM 项有 236 个,^⑦而到 2010 年年底通过审批的项目增至 2874 个。^⑧ 另一方面,CDM 也“极大加强了相关政

① Geert De Cock,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Bilateral Norm Leader on Climate Change Vis-à-Vis China,"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16, No.1, 2011, p.102.

② Matthew Hoffmann, *Climate Governance at the Crossroads: Experimenting with a Global Response After Kyo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9-134.

③ David Belis and Bart Kerremans, "The Socialization Potential of the CDM in EU-China Climate Relations," pp.543-559.

④ Geert De Cock,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Bilateral Norm Leader on Climate Change Vis-à-Vis China," pp.96-99.

⑤ 具体数据和案例研究参见 Bo Wang, "Can CDM Br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DM Projects," *Energy Policy*, Vol.38, No.5, 2010, pp.2572-2585.

⑥ Ye Qi, et al., "Translating a Global Issue into Local Priority: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Vol.17, No.4, 2008, pp.387-389.

⑦ Alex Lo and Michael Howes, "Powered by the State or Finance?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a's Carbon Market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54, No.4, 2013, p.388.

⑧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发展状况》, <https://www.ccchina.org.cn/Detail.aspx?newsId=14907&TId=57>,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0日。

府部门、企业、组织和个人的气候变化意识”。^① 为了更好地管理 CDM, 中国政府引入高校(如清华大学)、政策咨询公司(如中创碳投)和国外的专家参与政策咨询和能力建设。这些活动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即中国对 CDM 的管理机构)在立项引导和审批、CER 指导价设置和项目监管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提升。^② 此外, 碳交易所、商业咨询公司和核查机构也纷纷建立。这些机构不但提升了企业参与 CDM 的能力, 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能力建设服务。^③ 为加强在政策沟通、低碳技术和 CDM 等方面的合作, 中国与欧盟于 2005 年建立了气候变化双边伙伴关系, 并且建立起包括峰会、双边磋商、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在内的多层级合作机制。双方的具体合作领域除技术研发和转移外, 还包括为中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制定提供支持。^④ 中国参与 CDM 的早期经验和知识积累使相关决策者相信, 市场行为体已经具备了参与碳定价的基础性能力, 且政府已具备了一定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市场管理能力。^⑤ 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 CDM。2008 年, 全球已有 4000 多个 CDM 项目, 亚太和拉美地区国家的立项数明显增多。^⑥

总之, 欧盟以欧洲碳市场为引擎, 以 CDM 为媒介, 通过向发展中大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及利用 CDM 合作契机开展多层次交流的方式, 成功推动了碳定价理念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这符合场所转移策略的一般原理, 即通过利益引导和话语互动推动新规则的扩散。当然,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发展中国家对 CDM 的参与并不足以完全扭转其对气候治理和碳定价的认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都主要将 CDM 视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⑦ CDM 的本质是跨国资金转移机制, 而非国内碳定价机制。发展中国家参与 CDM 只有收益没有损失, 但在国内实行碳定价规则意味着要建立包括排放控制目标、配额分配机制、排放核算、履约监督、交易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8 年 10 月)》, http://www.gov.cn/zhengce/2008-10/29/content_2615768.htm,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

② Katarina Buhr, Philip Thörn and Mattias Hjerpe,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China: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Vol.22, No.2, 2012, pp.83-84.

③ Gørild Heggelund, et al., “China’s Development of ETS as a GHG Mitigating Policy Tool: A Case of Policy Diffusion or Domestic Drivers?”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Vol.36, No.2, 2019, pp.179-180.

④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滚动工作计划》, <https://www.mfa.gov.cn/chn/pds/ziliao/tytj/t283033.htm>,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

⑤ 参见《中国参与国际碳交易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http://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09/11-20/1975852.shtml>,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5 日。

⑥ 《环境署:全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超过四千个》, <https://news.un.org/zh/story/2008/12/105652>,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5 日。

⑦ Zhongxiang Zhang, “Why Has China Not Embraced a Global Cap-and-Trade Regime?” *Climate Policy*, Vol.7, No.2, 2007, p.168.

等一系列复杂的规则、政策和机构,且不得不从根本上转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着不确定的潜在制度和经济成本。^①换言之,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参与CDM的过程中体验良好,也初步积累了参与气候治理的经验,但若要在国内建立碳定价政策,尚需要更具说服力的理由。^②

(二) 规则制衡与欧盟单边规则推广行动的挫折

虽然通过CDM和各类双边气候合作推动规则扩散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多边平台上气候谈判进展缓慢,欧盟推动全球性减排和碳定价规则全球化的心态也愈加急切。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未能如愿达成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治理安排,这打击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与此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并显著冲击了欧洲的经济增长,而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又导致欧洲碳市场配额需求下降,造成欧洲碳价大幅下跌。

在此背景下,欧盟决定尝试采取单边行动,强行推动碳定价机制外延到欧盟以外的地区。2011年年初,欧盟宣布自2012年1月起国际航空将被纳入欧洲碳市场,所有出入欧盟的国际航班都将获得免费配额,超过配额的排放量需要缴纳碳税或通过交易获得相应额度。^③这项单边政策旨在用欧盟的碳定价机制规制全球航空业,迫使各国航空业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就此意义而言,欧盟的规则推广行动出现了单边化和强制性倾向。

显然,这一单边行动违背了既有多边气候协定关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也过度延伸了欧盟的管辖权,与国际法的国家主权及协商一致原则相抵触。^④欧盟的举动很快遭到广泛批评和抵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等航空大国或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内、或以双边和复边形式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和抵制欧盟的政策。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甚至美国都直接出台了相关政策或法案,明确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与欧洲碳市场。^⑤在各国的普遍反对下,欧盟的航空碳税政策最终无限期停摆。欧盟此次行动的失败也表明,虽然碳定价理念在双边气候合作推动下已经有所传播,但在当时尚

① Alex Y. Lo and Michael Howes, "Power and Carbon Sovereignty in a Non-Traditional Capitalist State: Discourses of Carbon Trading in China,"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5, No.1, 2015, pp.60-82.

② Bowen Yu, "Bureaucratic Deliberation and China'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Ideas: A Case Study on China's Adop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1, No.136, 2022, pp.558-573.

③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EU ETS & Aviation," https://www.ieta.org/resources/Resources/3_Minute_Briefings/3-minutes-briefing_eu-ets-aviation_final-01192012.pdf,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5日。

④ 刘衡、黄志雄:《论欧盟航空碳税“停摆”的原因与启示》,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10期,第67页。

⑤ 刘衡、黄志雄:《论欧盟航空碳税“停摆”的原因与启示》,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10期,第67—68页。

未成为全球普遍共识。在新规范和新规则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贸然在规则推广活动中动用强制性手段会激起普遍的规则制衡行动。

(三) 积极治理绩效与碳定价规则的进一步扩散

虽然欧盟单边推动航空碳税的尝试未能成功,但碳定价规则的扩散并未因规则制衡行动的出现而停止。除全球气候谈判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后取得一些进展外,^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地碳定价规则(尤其是欧洲碳市场)的持续运转使人们看到了碳定价在平衡减排与经济发展、规训市场行为者以及支持低碳转型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治理绩效。第一,2008—2011年,一些研究测算出欧洲碳市场产生了超过2%的减排效果。^②针对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碳税政策的研究也指出,碳税在成功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减排的同时,并未对其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③第二,欧洲碳市场和北欧国家的碳税政策向欧洲企业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和经济激励,促使其积极开展对清洁科技和提升排放效率方面的投资。^④第三,欧洲碳市场和碳税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更多财政收入,使它们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其他类型的气候政策(如低碳技术研发激励项目),并且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收集和分享排放数据的能力。^⑤

以这些现实绩效为坚实基础,碳定价的积极治理绩效经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宣传和推广进一步为发展中国家所感知。例如,世界银行于2011年设立了“市场准备伙伴计划(PMR)”,旨在为发展中国家采用碳定价规则提供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等方

① 如在2011年的德班气候大会上,各国同意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研究建构适用于所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的统一的气候制度框架。这提振了各国对于全球气候谈判的信心。

② A. Denny Ellerman and Barbara K. Buchner, “Over-Allocation or Abatement?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EU ETS Based on the 2005–06 Emissions Data,”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Vol.41, No.2, 2008, pp.267–287; Barry Anderson and Corrado Di Maria, “Abatement and Allocation in the Pilot Phase of the EU ETS,”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Vol.48, No.1, 2011, pp.83–103.

③ Martin K. Enevoldsen, Anders V. Ryelund and Mikael Skou Andersen, “Decoupling of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₂-Emissions in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Scandinavia,” *Energy Economics*, Vol.29, No.4, 2007, pp.665–692; Charles Komanoff and Matthew Gordon, “British Columbia’s Carbon Tax: By The Numbers,” https://www.carbontax.org/wp-content/uploads/CTC_British_Columbia’s_Carbon_Tax_By_The_Numbers.pdf,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7日。

④ Alexander Eden, et al., “Benefits of Emissions Trading: Taking Stock of the Impacts of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Worldwide,”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75,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8日。

⑤ Alexander Eden, et al., “Benefits of Emissions Trading: Taking Stock of the Impacts of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Worldwide,”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75,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8日。

面的支持。^① 中国、泰国和土耳其等国的碳市场建设都得到了 PMR 的直接支持,PMR 还支持智利和南非等国构建或更新了碳税规则。^② 2015 年,世界银行又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建立了“碳定价领导联盟”,旨在进一步促进各方交流碳定价的最佳实践和研究成果,激励对相关政策的学习和效仿。^③ 参加过这些项目的国家都明确表示相关活动对其国内政策构建有积极作用。^④

中国对碳交易规则的接纳是基于治理绩效的政策学习的典型例证。以 2007 年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为标志,中国开始建构国内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体系。在随后几年的政策试验和研究中,碳交易逐步得到重视,这既是基于中国决策者在参与 CDM 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对碳定价政策的好感和信心,^⑤也来自决策者对各种政策选项治理绩效的评估。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一五”规划)期间已采用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指标分解加行政考核的方式推进节能减排目标,但在“十一五”规划末期,以行政命令促进减排的治理模式产生了一些问题。^⑥ 在此情况下,援引欧洲碳市场在平衡减排和发展方面积极治理绩效的研究,中国决策者认为碳交易将能较好地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并降低减排的社会和经济成本。^⑦ 中国自 2011 年开始的碳交易试点进一步体现了碳定价的积极效果:首先,碳交易试点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截至 2017 年,7 个试点覆盖了 20 余个行业的近 3000 家实体,交易额达到 45 亿元人民币。^⑧ 数据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对企业(尤其

①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About,” <https://www.thepmr.org/content/supporting-action-climate-change-mitigation>,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②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Implementing Country Participants,” <https://www.thepmr.org/pmr-impliments/0>,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③ 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 “Who We Are,” <https://www.carbonpricingleadership.org/who-we-are>,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

④ Ebbe V. Thisted and Rune V. Thisted, “The Diffusion of Carbon Taxes and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The Emerging Norm of Carbon Pric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9, No.5, 2020, p.816.

⑤ Gørild Heggelund, et al., “China’s Development of ETS as a GHG Mitigating Policy Tool: A Case of Policy Diffusion or Domestic Drivers?” pp.179–181.

⑥ 陈健鹏:《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政策工具演进的视角》,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 年第 9 期,第 26—32 页。

⑦ 熊小平、戴彦德、康艳兵:《碳交易制度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30 页。根据该书作者的说法,此书的最初版本为提供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决策咨询报告。有关中国对欧洲碳市场态度的其他记录,参见深圳碳交易考察团:《学习借鉴 EU-ETS 经验与建设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载《开放导报》,2013 年第 3 期,第 50—63 页;Diarmuid Torney, “Bilateral Climate Cooperation: The EU’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India,”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5, No.1, 2015, pp.113.

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17 中国碳市场进展》, https://www.edf.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he_Progress_of_China%27s_Carbon_Market_Development_Chinese_Version.pdf,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

是大规模企业)的低碳转型和低碳技术研发产生了正向激励。^① 其次,各地方政府与中外专家通力合作,仅用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各试点的规则体系建设。中央政府层面的能力建设在欧盟、世界银行(PMR项目)和国内机构(如清华大学)的支持下同步展开。各级政府的政策学习热情和高效的政策执行力提升了中央政府决策者管理碳市场的能力和信心。^② 再次,在碳交易所和咨询公司的支持下,相关企业参与碳交易的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根据2017年的一项调查,88%的受访企业认为其排放监控和报告方面的能力已经较为完备,超过一半的企业认为自身具备了较好的交易能力。^③ 最后,碳市场建设行动的快速推进给企业释放了强烈的政策信号,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碳减排和碳资产管理纳入短期和长期经营规划。^④ 由此可见,虽然碳交易在中国最初仅以试点形式存在,但相关试点已能够产生广泛的低碳转型效应。这些经验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碳定价规则扩散的最初动力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集团)在双边层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引导和劝说行动。这符合场所转移策略的运行逻辑。但场所转移并非碳定价规则长期稳定扩散的决定性动力。各方曾联合采取规则制衡行动,阻止了欧盟施行单边航空碳税的行动。真正促使各国采用碳定价政策的是欧洲碳市场和其他地区的碳税实践所展示出的积极治理绩效以及相关国家在本土政策试验中取得的积极效果。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碳定价发展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发达国家可能会利用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再次采取单边规制行动加速新规则的扩散。例如,欧盟和美国正尝试建构碳边境调节税机制,该机制一旦落地,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经济损失。^⑤ 此类单边行动会引发发展中国家怎样的反应?是否会再次激发规则制衡?这些问题值得予以持续关注。

① 刘晔、张训常:《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研发创新——基于三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科学》,2017年第3期,第102—114页;刘传明、孙喆、张瑾:《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碳减排政策效应研究》,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1期,第49—58页。

② Katja Biedenkopf, Sarah Van Eyn and Hayley Walker, “Policy Infusion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 and Project Interact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in China,”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7, No.3, 2017, pp.104–111.

③ Dimitri De Boer, et al., “The 2017 China Carbon Pricing Survey,” http://www.chinacarbon.info/sdm_downloads/2017-china-carbon-pricing-survey/,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31日。

④ Wei Shen, “Chinese Business at the Dawn of Its Domestic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Incentives and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in Carbon Trading,” *Climate Policy*, Vol.15, No.3, 2015, pp.339–354; Lin Yang, Fengyu Li and Xian Zhang, “Chinese Companies’ Awarenes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in China,” *Energy Policy*, Vol.98, 2016, pp.260–261.

⑤ 龙凤等:《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影响与应对分析》,载《中国环境管理》,2022年第2期,第43—48页。

六 结论

场所转移是国际法学界研究国际规则演变时的常用概念。本文尝试综合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学界对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认识,深化对场所转移策略的短期和长期逻辑理解。从理论上,本文接受既有研究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短期成效依赖发达国家权力和话语优势的论断,但认为其长期效果取决于规则落地后的治理绩效。拥有积极治理绩效的新规则可以抵御各类外部批评和制衡,从而实现稳定扩散,而那些产生负面治理绩效的规则将在相关方的抵制和制衡下越来越难以快速扩散。基于这些假设,本文比较分析了 TRIPS-Plus 规则和碳定价规则的扩散进程,发现两者虽然都是西方大国推动规则扩散的典型示例,但是 TRIPS-Plus 规则的扩散进程因消极治理绩效而受阻,碳定价规则的倡导者欧盟虽然缺乏强制性权力,却因充分展示了新规则的积极治理绩效而成功推动其不断扩散。

本文的研究可以在四个方向上进一步扩展:第一,由于知识产权规则博弈和碳定价规则的扩散仍在进行,有必要进一步追踪相关规则的发展。第二,在碳标记、劳工保障、发展合作等领域,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场所转移策略来放大其谈判优势、推动新规则扩散。其中一些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些行动则以失败告终,对这些案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检验本文理论框架的解释力。第三,本文主要对话的是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研究。这些研究将场所转移单纯视作发达国家利用新场所推动规则改革的行动。如果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发达国家以外,则本文的主要理论观点即权力、话语和实践三大改革机制的协调与规则变革的长期效果紧密相关,将可以适用于更多在新平台培育新规则的尝试。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给了中国在国际发展、金融和环境等领域培育和推广新规则的机会。我们可以追踪相关实践,检视三大改革机制的协调配合能否促进新规则超越“一带一路”倡议本身而产生全球性影响。第四,本文将场所转移作为一种规则改革策略,主要关注其对规则的影响。从宏观上看,一些场所转移行动也可能会演化成集团对抗、建构“小圈子”的行为。如果场所转移策略成为某些国家开展战略竞争的工具,将会造成何种后果?这一问题值得予以进一步探究。

(截稿:2022 年 12 月 责任编辑:郭 泉)

count management

【Author】Huang Yutao,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orum Shift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Drivers and Constraints

Yu Bowen (96)

【Abstract】When developed countries fail to achieve their rule reform goals in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they may resort to a forum-shifting strategy, which involves shifting their rule promotion activities to bilateral or minilateral platforms where they have power advantages. The forum-shifting strategy allows developed countries to better motivate and persuade a smaller number of target countries to accept new rules, and then to promote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supporters and promoters of new rules,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changing traditional multilateral rules. However,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 forum-shifting strategy are uncertain. Mere material motivation and discursive persuasion cannot achieve stable socialization effects. What matters is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new rules after their initial implementation. New rules with a positive performance may continue to spread, weaken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mitment to traditional rules, and resisting rule-balancing activities. In contrast, new rules with negative performance will stimulate the reflexiv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be hit by rule-balancing activit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so-called “high standa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 rules and carbon pricing rules, both promo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supports this argument. In the case of “high standard” IPR rules,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EU)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initial diffusion of new rules through free trade negotiations, as the negative performance of such rules beca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ok measures such as resistance and balancing to maintain the norm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Southern countries” in the IPR rule system. In the latter case of carbon pricing rules, although the EU's attempts to

promote new rules also faced setbacks, the positive role of carbon pricing in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has been validated, leading to the continuous diffusion of new rule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rules, forum shifting, rule competi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rbon pricing

【Author】Yu Bowen,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tructural Power and the Coupling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 Analysi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ses in Institutional Interpla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Zhuo Ye (126)

【Abstract】There exist both coupling and decoupling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refore, what could lead to the coupling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deed, focusing on unconformity between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ir leading states, existing researches could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ultiple members who enter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their structural power matter. Multiple members would exert their effects over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as well as efficiency, which endows them structural power; with structural power, they could bring about the coupling through convergence and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elementary institutions. On the contrary, multiple members with dependency on the leading state would lose their structural power, and then accelerate the institutional capture and fragmentation, which results in the decoupling. By taking the coupling between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World Bank as a positive case and the decoupling between Mekong-US Partnership and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s a negative case, this paper confirmed the above hypothesi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structural power, AIIB, MUSP, global governance

【Author】Zhuo Ye,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